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九〇期 ——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2c)

【风云人物】	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王广宇
【人物特写】	文革时期的朱多锦	杨 政
【往事如烟】	文革十日	阿 陀
【往事追忆】	北航“国际红卫军”事件	戴维堤
【难忘岁月】	批邓、悼周和粉碎四人帮	梁守福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风云人物】

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 王广宇 •

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起来造工作组的反，声称要夺工作组的权，被当时的工作组关了禁闭，打成了“反革命”。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文革小组得知此事后，派王力、关锋去清华大学的禁闭室单独同蒯大富谈话，了解蒯大富反工作组的观点和被关押情况。王力、关锋回来后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他们认为，蒯大富只不过反对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不准革命的错误做法，蒯大富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个有造反精神的学生。王、关还说他家庭出身也很好，是小手工业者家庭，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解救蒯大富，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中央文革的支持使蒯大富的名声鹊起，一夜之间从“反革命”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于是蒯大富趁势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任兵团司令。不久又成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注：据原首都三司负责人之一聂树人回忆，首都三司是由16个发起组织的代表16人组成负责人会议，并无蒯大富在内。见《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发表于五柳村网站）蒯司令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风云人物。

笔者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因工作关系同这些红卫兵领袖都有过接触，相比之下同

蒯大富打交道的次数不多，因为他太傲气。

我第一次见到蒯大富，大约是1966年8月，一个晚上，在中南海西门的一个接待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几个人接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头头，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内容我回忆不起了。仿佛是议论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方向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我参加了这个会并作记录。蒯大富在会上说话没准头，表现出颐指气使，左得可怕。从他的发言看，他真是一个“造反派”，他唯我独革，不讲政策，不顾集体。会后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的印象是造反精神有余，领袖的气度欠缺，办事不可靠。

蒯大富既然已成为造反派领袖、虽然他有些缺点，中央文革依然是支持他，并把他们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当成依靠对象。中央文革派了一个记者组常驻清华大学，及时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

我平时同蒯大富接触不多，都是因为有关紧要工作找过他两次，每次我找他，他都带搭不理，向他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他都不在乎。以当时中央文革的地位和权势，北京高校的红卫兵领袖，都把中央文革当成靠山、后台。因此，凡中央文革小组下达的“指示”，这些红卫兵头头都遵照执行，就连“老佛爷”聂元梓，对中央文革的“指示”也是惟命是从，唯独这位蒯大富司令对中央文革的“指示”可以不加理睬。可见此人造反精神之强。我举两个小例子：

1967年5月，部分军事院校的红卫兵冲击解放军报社。占领了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使解放军报社无法正常工作。林彪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副主任（一天也没有到职）、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关锋去解放军报处理红卫兵冲击军报事件。关锋带着林彪给红卫兵的指示信，说服红卫兵退出军报，并同冲击军报的各军事院校红卫兵头头谈判，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几个坚定分子，拒绝退出军报，赖在军报的编辑部办公室不走。关锋同一起去处理此事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商量，决定对这几个拒不执行军令的军事院校学员实行军法制裁，当场抓了几个学生（关了一两天就放了）。因冲击军报被抓的红卫兵头头所属组织当然要设法营救，他们有可能到北京著名高校串连，声援被抓学生。关锋想到这个问题后，马上决定，迅速向北京五大领袖传达军校红卫兵冲击军报的真相，以及为什么抓了几个拒不执行军令的学生，告诉五大领袖不要听信冲击军报的红卫兵组织的片面宣传，不要支持他们的错误行动。

关锋派我去找这些高校红卫兵头头，直接向他们传达这些意见。北师大的谭厚兰由关锋安排别人去传达，其余四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由我去传达。我从头一天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一直随同关锋在高度紧张中处理冲击解放军报事件，没吃、没喝、没睡，马不停蹄地又跑四个大学，在北大、北航、地质学院，分别向聂元梓、孙蓬一、韩爱晶、王大宾等人传达解放军报事件和对他们的要求。这些头头都积极支持中央文革的意见，保证不支持冲击解放军报的红卫兵组织。

到清华大学已经是次日上午九点左右，因蒯大富住无定所，一般人很难找到他。我费了很大劲，才算在一个宿舍楼找到了这位“司令”。蒯大富正在一间学生宿舍的上铺睡大觉，同学们把他喊醒，说有人找他有重要事，他翻了个身看到我，动也不动，爱搭不理地问：“什么事？”我说：“有一件重要事同你单独谈谈，请你起来我们找个安静地方谈，宿舍人太多。”蒯大富仍不动窝：“就在这说吧！我还困着呢。”我说：“这个环境没法谈话。”他还是不起床，然后他说：“你去找其他勤务员说去吧，我要睡觉。”我作为中央文革的办事员，以往开会常和蒯大富见面，他认识我。蒯大富对我的这种傲慢态度，在著名的红卫兵的头头中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我碰了蒯大富的硬钉子，只好找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另一位勤务员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意见。

蒯大富这时翅膀已经硬了，他的权势不仅在京城而且伸向全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全

国各地横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影子，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内部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其他不同意见的勤务员，造成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不团结，甚至分裂。对这个情况，1967年夏天一位同我比较熟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勤务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休息时，向我倾诉了她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内部的团结的深切忧虑。她说：“我们这些同学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起起来造反的，我们共过患难，现在掌了权，蒯大富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太霸道了，许多勤务员对他敢怒不敢言。这样下去，清华井冈山早晚要造成分裂的。”说着，这位勤务员流下眼泪。

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发生后，7月25日在天安门前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北京著名高等学校红卫兵头头都上了天安门城楼，五大领袖自不必说。当王力拄着双拐，包扎着断腿，一瘸一拐地走上城楼后，各造反派头头蜂拥上去将王力团团围住，问这问那，表示慰问。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王力坐在沙发上，红卫兵头头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简直是水泄不通。趁着大会开始前，向王力提出了许多有关“武汉事件”的问题，包括“武汉事件”的经过，百万雄师，发动“武汉事件”的背景，各军区的情况，提出了许多当时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人多嘴杂，王力回答也没头没脑，不知所云。直到宣布大会开始，红卫兵才散去。

大约过了几天，可能是1967年8月中旬，解放军报社的赵易亚、杜越凯到钓鱼台探望王力，杜越凯顺便问王力一件事，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办的小报登出了王力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不知是否有此事。王力解释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怎么能讲话，那些红卫兵把我围起来，东一句西一句地提问题，我随便应答，哪里有什么讲话。”据说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登出的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内容涉及军队的元帅、将军；“七二〇事件”后台，要打倒谁之类的内容，王力也没看到这个小报。王力得知此事后，把我叫去，叫我马上给蒯大富打电话，叫他收回那份登有王力讲话的小报和传单，并发表声明宣布这个传单的内容是虚构的、错误的，以挽回小报散布的谣言所造成的影响。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找蒯大富接电话，有人说他不在，也可能他故意不接电话。我只好把王力批评蒯大富，要求把制造的王力讲话收回的意见传达给另一位勤务员，让他尽快转达给蒯大富，让他马上发表声明，并收回那份杜撰的“王力讲话”的小报。可能那位勤务员已经转告给蒯大富，但未见蒯大富有任何动静，他既不收回小报，也不发表声明检讨，依然我行我素。

过了几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碰到了蒯大富，便问他：“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事，那位勤务员给你说了吗？”他漫不经心地说：“知道了。”我问他：“发表声明了吗？”他转身就走了。

这里我不是来辨别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真假，而是通过这件事来看蒯大富对待当时正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态度。他对王力的批评居然置之不理。可见此蒯司令何等的牛气！

从另一方面说，蒯大富又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头头，他抵制关锋、王力的“指示”，可以解释成他早就预见王力、关锋必然垮台，才不买他们的账，究竟是因为什么，只有蒯大富自己心里明白。

□ 原载《记忆》第十一期

~~~~~

【人物特写】

文革时期的朱多锦

• 杨 政 •

朱多锦在大学时的名字原叫朱孝全，后名为朱晓泉。我们是1965年暑期考入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我们是中文系65级，这一级有三个班，我是一班，他是三班。文革一开始，朱多锦也曾跟着“革命”过一阵子，但是，很快他就拒绝参加文革中的所谓“革命活动”而将文革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开始了他否定文革的“文革研究”，多少年后，他的一位朋友在写给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到他：

你在昨天捡起一段沉重的历史 / 它的名字叫“文革” / 你说：“我把它拿到明天研究研究。”  
/ ——你几乎搬不动它 / 你为搬动它曾被坠进地狱。（徐树爱《思考命运的思考》）

在大学时，因与朱多锦（朱晓泉）同级不同班，一开始对他并不熟悉。听到“朱晓泉”这个名字是在上大学的第三个年头（1967年）了。那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年，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热火朝天，“革命派”开始夺权，山头林立，派战不断，而一些人或渐趋逍遥、消极，或为自己没能跟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惶惶不可终日。朱晓泉这时却断然拒绝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活动。这已经是够出格的了，更有甚者是，他竟在这个时候开始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开始偷偷地批判文化大革命。这就开始了他的否定文革的“文革研究”。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文革’中研究‘文革’，先是预言‘文革’的前途（他预言，‘文革’一定是个否定之否定的前途——笔者注），接着是对‘文革’兴起根源的思考，其中又先有着为寻找‘文革’兴起根源而寻找‘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的思考，于是便又有着为寻找‘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而对自己的思考的思考。”（朱多锦《炼狱自己》，见诗集《沉思岁月》第249页）。

当时，同学中对他反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议论颇多。为了观察文革发展态势，他广泛搜集各种类型的资料，以至于几乎成了搜集资料的狂人。他不分昼夜地在大字报栏前抄啊抄，忘了吃饭，忘了休息。他去外地串连，亦进行着这件他认为神圣的工作，于是山东师范学院铺天盖地、无以计数的大字报、全国各地许多大字报和油印小报，都不断地汇集到他的手中。当时有收废品的到校园来，很多同学就将一些油印大字报底稿都当废纸卖了，他就用从仅有的几元钱的助学金中挤出来的钱再买回来。现在，他说他掌握了文革的很多资料，应该不是妄言（今天，对他所占有的关于文革的资料，有人出惊人的高价收买，但他拒绝出卖，虽然他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关于他搜集文革资料的事，还有这样一段情节：当年，我们“分配”工作后，终于离校了，当大队人马走后，朱多锦因不能分配，还留住原来的学生宿舍里，而他到了这个时候，却还在搬空的各间宿舍里寻找大字报、油印小报等文革资料，忙得不亦乐乎！据朱多锦的日记所记，1970年8月16日（中文65级同学于8月10日离校）一整天都在人走楼空的各房间里收拾大字报资料。这真令人感慨万千，命运到了那种地步，他还能有这种心情搜集什么文革资料！这一切，他当然都是不动声色地进行的（幸亏他没有声张），知道他意图和具体行踪者极少。然而，知道他是书呆子，不入群，拒绝参加文革活动的人却很多。他被视为“怪人”。当时，同学们对他是避而远之，不愿与他住同一间宿舍。这其实倒成全了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自己独处一室（先是在中文系男生宿舍楼一层，走廊北面最东头靠厕所的那间），自由自在，独来独往。

由于朱多锦的文革研究行为，在1970年春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山师中文连（当时中文系改称“中文连”）65级同时遭难的还有好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个同学还因此而跳楼，以至终身残疾。到夏天，我们65级的学生终于开始分配工作（65级学生本应1969年暑期就毕业分配的）——所谓分配工作就是先到部队

农场“劳动锻炼”——但朱晓泉不能去部队农场，他被留校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和他同时遭难的几个同学到那时已都被解放而和全级同学同去了部队。据朱多锦说，他当时躺在现在的省纺织厅西边的路口处，正因病而发着高烧，那时那里还是一片田地，是眼看着他的同学被一辆辆汽车拉走的。“他们都分配工作了，但我不能。”他回忆说，“1970年7月29日，中文连（系）65级宣布分配方案，在中文连，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不分配工作——那两个同学，其中一个就是那位跳楼的同学，当时他还在医院里；还有一个女同学是因为精神出了点儿问题；我是因为被认为犯了恶毒攻击‘文革’的‘恶攻罪’，而且还被说成形成了‘反动’系统的思想体系。属于我这种情况的，我们全系学生中就我一人，全校学生中就我一人。现在说来，是因为我早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对‘文革’的否定性思考——现在是称‘文革研究’了。我在‘文革’中的‘文革’研究，决定了我终生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位置，亦即决定了我终生的命运，直到今天我还在为此而付出代价。”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宣布对他审查后，接着在一天的午后便抄了他在宿舍中的所有东西；很快又有人到他老家（齐河县赵官镇公社程官庄）抄了他放在家里的书籍，据说在他家抄出的除了他所搜集的文革资料外（大都是当时各派油印的一些大字报底稿），就是一本《新旧约全书》（圣经）和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一本《心理学》，当时去抄家的人在他村里到处调查他的家庭成份和他的表现，弄得全村沸沸扬扬，村里的人听说从他家里抄出了《资本论》就以为“他十分反动”，有的人说：“看看吧，原来这孩子竟藏着写资本家的书，真是危险！”还有人对《心理学》一书甚感疑惑，说：“这可了不得，叫他知道了咱的心理，还不知会怎样呢！”

他被宣布“留校监督劳动改造”后，1970年秋天便随山师迁校去了聊城（那时，大学都被赶到下面去办）。在迁往聊城的山师中文系，他先是在山师南院里劳动（山师迁到聊城后，分南院、北院——南院占原聊城师范的校址，北院占原聊城农校的校址），后来（1972年夏）又被放到山师办在聊城城外西北通往临清的公路西侧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秋才分配工作。

在聊城能够与他有所交往的是处于相似境遇中的几位老师，他们在精神上与他同命相怜，鼓励他坚强地活下去。

山师迁到聊城后，春节到了，就要放寒假了，朱多锦几经要求，最后终被允许回家过年。一天午后，庄维石老师对他说：“朱晓泉，你过来——”庄老师把他叫到教师集体宿舍门口塞给他5块钱。5块钱，在当时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朱多锦来讲。庄维石老师在中文系原是教古典文学的，正直，性格倔强，1957年被打成“右派”。庄老师说：“朱晓泉，我知道你很难，我给一个任务：要活下去！”庄老师使他体验到这个世间还有着真正的人情的温暖。直到今天，每回忆起庄老师来，他仍然满目深情，激动不已。

当时和朱多锦接触最多，对他帮助最大的是教育连（系）的王立功老师。当时山师教育连（系）合并到中文连（系）。他在南院伙房的时候，王立功老师也在南院伙房劳动；在伙房里，一些人常欺侮朱多锦，朱多锦只是含泪不语，王立功老师这时总要给朱多锦说上几句好话；每看到朱多锦实在没钱了，王立功老师常就帮他一些，叫他去买件衣服；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谈心，使无助中的朱多锦有了依靠。以后，朱多锦到五七干校去了，王立功老师还去看他。文革之后，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师生之谊。后来，正是王立功老师见证了朱多锦当时的一些情况。那时，对那种生活，朱多锦已经习以为常，非但对自身的不幸不自暴自弃、自惭形秽，反而变得乐天知命，达观处之，并一直躲开人在读书、写诗，其诗思竟开始涌流。关于他那时的情况，王立功老师在后来所写的《关于诗的一封信》（写于1984年9月。见朱多锦诗作诗论选《沉思岁月》第422页）中这样写道：

……有一次，我去干校，远远地看见一个年轻人正牵着一只狗——干校的那条狼狗——在草地上跑着、跳着。走近了，我才发现竟是您。您红着脸向我走来……我们并肩走过了一段路程。

“这，多好！”您没头没脑地说。

“什么多好？”我问。

“跑哇、跳哇，出汗哇，在草地上打滚啊！还有狗、羊、小河、石子，长在路边的白杨——什么都好！”我们沉默下来了。听着您的天真的‘什么都好’，我竟悲哀起来。

“那，多好——”您又没头没脑地说。

“哪多好？”

“蓝天、蓝天上的太阳和蓝天下的人——可我们头上为什么总是有着云呢？我想……”您说，“不管怎样，我们总应因为我们是人而感到幸运。人生活着，应当是美好的！”

王立功老师对此感慨万端。在王老师看来，朱多锦当时一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着如此沉重打击、折磨的人，一个被命运抛弃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竟仍然拥有着这样一颗热爱人生、乐观向上的心，王老师由此想到了他平时的“总是沉默”，他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您之所以‘总是沉默’，是因为压抑。凡是必须压抑自己的人，内心里总是奔腾着情感的岩浆，只要给他一个突破口，便会有火山爆发。您这个人应当有着您自己的诗。”事情真是这样，文革后，朱多锦原来“内心里总是奔腾着的情感岩浆”终于找到了爆发的“突破口”，于是诗情大发，佳作连连。

薛绥之老师是山师中文系的鲁迅研究专家。当年，薛老师也曾和朱多锦在山师南院伙房一块劳动。一次，他们去拉煤，用的是一辆笨重的地排车，去的路上，朱多锦向薛老师提出一些关于鲁迅研究的问题。他问薛老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中医常是有意无意的骗子，难道真是这样？”薛老师不回答，环顾左右而言他：“哎，小朱，今天真热——”可是将煤运到山师南院伙房后，薛老师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给他说：“小朱啊，你先好好地学习，什么也先别说，听老师的话没错！”多少年后，朱多锦写出了《鲁迅研究新阶段的到来》（1986年10月9日于齐河师范，发表于由陕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1987年第七期《社会科学评论》。见《发现与批判》一书65页）、《鲁迅“反思意识”批判》（1988年10月9日于齐河师范，先辑于1990年12月由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中外文化》一书，后发表于由山东大学主办的1997年第三期《青年思想家》杂志。见《发现与批判》一书531页）等一系列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这与当年薛老师的嘱咐不无关系。

还有一位曾在中文系教希腊、罗马文学的李广熙老师。朱多锦是在山师办在聊城的五七干校认识这位李老师的。1957年，李老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倍受煎熬，当时被罚喂干校的那头驴，在干校的最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一个人只和一头驴相依为命。白天，他喂饱了驴，便将驴套在运粪车上，进城去山师南院、北院将从厕所里挖出的粪尿运到干校来，每天赶着驴车不断地来回跑。人孤独着，闷了，便和那头驴说说话。朱多锦到干校后，有时到李广熙老师的小屋里坐坐，他发现李广熙老师正在偷偷地编一本《希腊罗马神话词典》，仔细地将有关资料都制成一张张的卡片。李老师在那种环境里不忘治学、研究的坚韧精神感动着他。当时，李老师给了他很大的精神鼓舞，给他讲了很多希腊、罗马文学的知识。李老师的《希腊罗马神话词典》终于文革后的1985年4月印出，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戈宝权先生题写了书名。朱多锦说，他在齐河师范教书时于1985年6月28日收到李老师寄给他的《希腊罗马神话词典》。在五七干校，他和李老师的一些对话至今还响在他的耳旁——那是一天傍晚，他又来到李老师的小屋，他说：“天黑了——”李老师对答说：“早晨也就不远了。”

在山师南院，中文系的吉宜人老师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当时吉老师在山师南院伙房里任司务长，对在伙房里“劳改”的朱多锦、李钟琦的处境很是同情。

朱多锦的磨难是一条长长的路，从1970年3月22日宣布对他审查，到当年12月5日宣布定性，直到文革后，等他在禹城八中（莒镇）教书时才获平反，他说，那是1980年5月5日，他收到了寄给他的平反通知；直到他调到禹城一中（禹城县城），才于1981年11月5日收到补发工资的通知，于11月20日到山师的“落实政策办公室”领到补发给他的工资1007元（补发从1970年8月到1973年9月的工资，扣除其间每月曾发的生活费），到1982年1月13日，他又领到由禹城县教育局补发他的晚转正定级的工资差额款360元（从1973年9月到1977年10月）。这样，从受难到平反结束前后共12年——12年成了他的人生炼狱。12年中，他一直进行着他的文革研究（他写下的文革研究的稿纸已有很高的一大摞）和新诗的写作。这个过程正如他在文革后的1983年1月29日写的一首诗《我是煤，我要燃烧》（见诗集《沉思岁月》232页）中所写的，他是“树”，在天地翻覆中被翻入地壳深处，结果变成可燃的煤，这是一种炼狱的神秘造化：

为了一个神秘的造化 / 整个宇宙都曾重新配调—— / 山，陷下去 / 地，隆起来 / 海，到不曾到过的地方呼啸 / 我带着太阳的活力 / 被翻进深深的地壳 / / 铸造，铸造…… / ——脱骨换胎，汗煎血熬 / ……我的身躯 / 凝固着岁月不屈的火苗 / 铸造，铸造……

这是朱多锦的命运的自白和宣言。

□ 摘自《华夏文坛》2007年第一期。

~~~~~

【往事如烟】

文革十日

• 阿 陀 •

◇ 抢枪

（一）

一九六七年夏天。

中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年，正进入 “全面武斗”高潮阶段。

那年我将满十七岁。

八月九日，午后校园里。

一排排凤凰树上，殷红殷红的凤凰花连绵成片，开疯了似的，一眼望过去，恍若熊熊燃烧的漫天大火……成千上万只伏在树上的蝉儿，发出沙哑的巨大共鸣之声，在热得发烫的空气中崩出一阵阵 “铮铮”的裂帛颤音…… “瞿——瞿——瞿——”

“红色造反团”司令胡头突然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口哨。我们 “激流纵队”几个同学正在课桌边吃饭，边下军棋打扑克，听到哨声大家立刻扔下饭盆冲出门去。

“…… 现在广州已经打成一锅粥啦，到处都在抢枪。‘老保’（注）有军区撑腰，枪枝弹

药明抢暗送，如果我们造反派再不行动，手无寸铁，等死呀？！‘文攻武卫’，抗暴有理！今日目标——广钢和广船‘民兵武装部’。工人造反派大佬会配合我们，车马上就到。我们白鹤洞山顶好似孤岛，下山闯入老保地头，肯定是玩命！现在给一分钟，每人自己决定，不愿去的可以退出。”

我后悔今天回学校了。

我知道最近造反团已分出一部分身强胆大的男同学，组成一支“武工队”，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我既非武工队员，甚至也已经脱离学校运动有一段时间了。（其时我代表造反团参加一个跨校的独立宣传组织——“红司呐喊”，常驻市内。）我完全可以有籍口不参加这次行动。别看咱大小也算个头目，千把人的大场面上不打讲稿就能慷慨激昂一番，其实本人胆子特小，从小到大就没真打过架，此时更紧张害怕得胆汁往上翻——一口都苦了。

“不怕死的，上前！”胡头举起拳头大吼一声。

一排十几个人，大半都站出去了一一全是武工队的。我的身子本能地想往后缩——可是远离大脑指挥中枢的脚却不由自主地向前跨去……

若干年后，在海南岛听一个参加过“西沙之战”的“战斗英雄”调侃自己：“登上无人岛，冷不防迎面撞上一个越南兵，我的一个反应就是要举手……没料到他举得比我还快，结果我只好成‘英雄’了……”

我跨出了这一步，虽然成不了“英雄”，但在当时，若要当“狗熊”，同样也是要很大勇气的。自尊心差一点让我在这次行动中成为冤枉送命的“英烈”。

（二）

两部吉普“嘎”地齐齐刹在教室前面。

车上跳出几个手拿长短枪的工人，其中还有我认识的绰号“黑皮”的广船学徒小吕，他抬起手上的步枪，枪口指着我们边晃边叫：“快上车，快上车”。旁边的人连忙把他的抢头拨到一边。

“这回来真的了！”我的心吊到嗓子眼上，眼睛盯着黑皮手上那杆老掉牙的“三八大盖”（一九三八年造），两脚象钉在地上，一动也不会动。

就在我楞神的这一会儿，参加行动的人已经分别上了车，我大概是最后一个，糊里糊涂被安排在准备打头的大吉普车外。车头右边是武工队二把手“拼命三郎”。他腰扎武装带，手提驳壳枪，反戴着军帽，威风凛凛地站在外踏板上。我的位置是邻着司机的左踏板。手上唯一的“武器”是三郎褪下来的皮枪套。

两部车一前一后风驰电掣冲出校园。

热风灼面。我的脑袋乱哄哄的。广州四大重工业企业，就有造船厂和钢铁厂两个集中在我们白鹤洞地区。产业工人大部分都参加了保守派（又称“东风派”）。两厂之间夹着一个“白鹤洞人民公社”，也是保守派农民组织的重镇。我们这趟行动简直是“虎口拔牙”，够玄乎的。



骄阳下，行人稀少，只有一条老癞皮狗大模大样地躺在路当中晒得滚烫的沙土上打盹。汽车擦背而过，老狗只是抖抖耳朵，身子纹丝不动。

我现在明白了自己的角色：一旦中埋伏，决定全车人命运的只能是司机。我的任务是掩护司机，怎么掩护？难道用枪套？——恐怕只能靠身体了。

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豪情……

（三）

出师不利一大忌。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钢厂。车刚到门口，传达室就有接应的人出来挥手拦截，告知武器已被转移。我们只好立即掉头扑向船厂。

广州造船厂负军工生产任务，因此不同于广钢，戒备森严，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守卫大门。

才透过树荫瞥见船厂的大铁门，我们打头这车已经倏地急刹在哨兵跟前。“干——干——干什么？你，你们要——干——干什么？”小个子兵煞白了脸，端起枪指着我们，一个劲想往后缩。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另一辆车已从侧后兜上来截住他。趁哨兵回首分神一刹那，三郎从车上纵身一跳，居高临下就势来了个，“饿虎擒羊”，把他扑倒在地，死死压住。胡头和另外两个人围上去，拧胳膊掰手指，费了好大力气才卸下哨兵手里的半自动步枪。我和其他人连忙拉开大铁门，随后纷纷追着跳上车，扔下那气急败坏在后面跺脚大骂的哨兵，绝尘而去……

因为半年前我曾在广船参加过一段“学工”劳动，两个月前又到该厂“静坐”，声援同一派的工人，并进入厂部大楼参与和军代表的谈判，知道“武装部”就设在大楼内。此时工厂正值中午用膳和交接班时间，主道上熙熙攘攘全是人。为了不打草惊蛇，汽车绕了一个弯，从侧面驶到楼前。所有人都跳下车，正准备冲进去，忽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台阶上气急败坏地跑下来，摆手叫我们快撤。

一定是消息泄漏，枪枝又被转移了。大伙都意识到情况不妙，一个个争先恐后爬回车上，逃命要紧。司机这回也不走原路了，一踩油门就绕过大楼前的喷水池，冲上主大道。汽车立时被满坑满谷穿蓝色工作服的人潮堵住了。司机只得狂捺喇叭，喇叭声瞬间便淹没在四周嘈杂人声和头顶上高音喇叭播放的震耳欲聋的进行曲之中。汽车如泥牛入海寸步难行。再拖延下去，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想都不敢想。

“啪、 啪、啪”……三郎情急之下突然朝天鸣枪，两辆车上四五条长短枪随后也爆豆似地乱响起来。刹时间鸡飞狗走，路上行人惊恐四散奔逃。瞧三郎一脸得意之色，此时我感觉我们就象一群土匪，就像电影里的“鬼子进村”。我站在车头分外扎眼，恨不得地上可以裂开个口钻进去，只好侧过脸对着司机，生怕碰上熟悉的工人师傅……

汽车一路畅通无阻冲出船厂。

阿弥陀佛，平安无事！娘娘的，玩不过，玩不过，以后再也不逞这个能了。还好，没尿裤子，回去还可以向手下的弟兄们吹嘘吹嘘。我一手紧扳着车框，另一只手别着枪套，叉腰挺胸，昂首迎风，努力作飒爽英雄状，觉得现在自己特象电影《铁道游击队》那深入敌后扒火车，抢军火的英雄刘洪。

眼下“刘洪”最大的愿望是赶紧回学校，战完那盘军棋……

天下事难遂人意。无奈英雄的上司继续革命意志坚决，不甘心就捞到那么一条枪——三家联合行动，分给谁都不合适，是不是？原来他们还有另一个备用目标——十几里外的一个派出所。于是车头一转，又杀将过去……

（四）

芳村派出所。

这是座落在城乡接合部，三面水田环绕的一个院子。绿树掩影，花木扶疏，午后的静谧中，就象座农家小院，透着一种淡淡的田园诗意。

寂静，可以是诗意，也可以令人窒息。

我只感到恐惧。

我只听见撕心裂肺的蝉鸣，脑袋嗡嗡直响。

多少年过去了，我始终记得，也始终不明白，那天前晌在校园里，后晌在派出所小院内，树上的蝉儿，为什么都一齐发疯似地狂鸣，连空气都为之颤抖，真有点天摇地动的感觉，前所未闻。据说蝉要在地里长眠好多好多年才出土，那一定憋得慌，叫起来自然就疯。那天是这样吗？不知道。我宁可相信，冥冥之中，蝉儿是在警告我：有危险，别去！别去！

“缴枪不杀！”

“不许动，举起手来！”

电影里学的词一句也没用上。

冲进去了，毫无抵抗，不，根本连人影都没一个。类似北方四合院的四间平房，门户洞开，安静得令人生疑。

我第一个反应是“空城计”？随着大伙闯入主厅，有人忙着先割电话线，冲在我前面的黑皮直奔柜台后那高大的枪柜，反手举起上了膛的步枪，就用枪托往大铁锁猛砸……这时我刚侧转身，接过传递给我的电话机，准备送出去。

“轰”一声巨响，双手贴胸捧着的电话机被枪弹打得粉碎。刹时眼前金星乱晃，左眼什么都看不见了，隐隐约约觉得左手血肉模糊，灼热灼热的。

当时我头脑中立刻产生一个幻觉：中埋伏了！我仿佛看见一个若隐若现的男人，跪在靠近天花板的小阁楼护栏后举枪瞄准：他还狠狠地骂了句——“丢那妈，死了去”，随即扣响了扳机……

与幻觉同时并存的是直觉。其实我心里明白，就是我一直盯着的黑皮手上那杆老破枪，撞击大柜时终于走火了。

该来的终归要来，跑不掉的。

◇ 在“吊劳改犯”的日子里

(一)

长堤，“广州市中山医附属第二医院”。

“澎”地，喧嚷声被关在门外了。白晃晃的墙壁，白晃晃的天花板，白晃晃的布幔……连充溢整个房间的来苏味都是白的。

我忽然有一种想吼叫的冲动，于是放开嗓子大唱起来：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样板戏、“少年先锋队队歌”“红梅颂”以及电影“英雄儿女”和“女跳水队员”插曲……想到什么唱什么，越激昂越好。

我平常不是一个爱唱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感到孤独。女人会用絮絮叨叨的言语和不尽的泪水来渲泄自己的寂寞。男人常常是有话不多言。有的男人喜欢在淋浴时高歌——当你赤身裸体，又回到婴儿般的原始状态时，便自然会产生一种想纵情释放的冲动。你倾诉，在哗哗的水声中，得到一种奇异的迴音共鸣。

此刻高歌是一种什么心理驱使？

我手上的血早已不流了，也不疼，只是还那么烫，麻辣麻辣的。我知道姆指已经飞走了，再也不会回来。左眼还在不停地流泪，明天会不会变成“独眼龙”？怎么告诉爸爸妈妈……？

我没有哭。我拼命唱。

那不是勇敢。也许只有歌声，才可以填满所有恐惧和惶惑的空间。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

当我醒过来时，手上已裹了厚厚的白纱布。我又被转送到西关的“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做了一次详细的眼科检查。阿弥陀佛，平安无事！大约只是电话机的碎片弹击到眼皮，没有直接伤到眼球。医生说人命大，不但擦着心脏过的子弹放了我一马，连眼睛也是完好无损，敷两天纱布就没事了。我该喜该悲？

第二天晚上，胡头带着几个人全套军装荷枪实弹到医院来看我，还拎来一大网兜水果罐头。我诧异问道：“都是穷学生穷学徒，哪来的钱？”三郎拨开众人，蹦上一张椅子，把头上的军帽甩在地上，叉着腰，模仿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列宁，摸摸额头，挥手往前用力一劈：“会有的，会有的，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着毛主席造反，一切都会有的！”众人哄堂大笑。大伙七嘴八舌告诉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广州市已经“毋王管”。现在各派组织实行“军事割据”，提枪闯进商店“以革命的名义”征用点慰问伤员的东西，谁敢反对？小意思啦。这时，胡头把一直躲在背后不吱声的黑皮拎着脖子揪到我床前：“快，低头认罪！”黑皮挠头搓手，脸都憋红了，就是吐不出“对不起”三个字来。胡头看到场面有点尴尬，连忙圆场说：“黑皮说啦，向毛主席保证，一定给你弄枝小手枪。”我瞄瞄比我还矮半个头的小学徒工黑皮，捶了他一拳：“憎死你！你就不怕我会用那支枪把你的手指打断？”黑皮只是呵呵傻笑。

临走，胡头对我说：“现在外面很乱，在医院里住多几天也好，这里的医生大部分都是造反派，不会赶你出院的。”

第二天上午，我把罐头留给同房病友，将没用过的止痛片扔进垃圾桶，扯掉眼睛上的纱布，就自行出院了。

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一个手缠白纱布，脖子还吊着绷带的中学生在街头走，会惹人注目。于是我解下吊带，又从医院小卖部买了一条毛巾，把左手包起来才上路。

走出大门，眩目的阳光象无数飞针刺过来，好半天都睁不开眼。待低头闭目静息片刻，慢慢抬起头来，我突然吓了一大跳——就在头顶上方不远，树上有两只光脚丫从浓荫中垂吊下来——是一具尸体！下面围着一圈人，象一群仰着脖子的鹅，叽里呱啦，议论纷纷……

空中弥漫着一股怪异的腥臭味。我忍不住呕吐起来。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八月十日，在素有“花城”之称的中国南方名城广州，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全市范围内市民滥用私刑处死所谓“劳改犯”的暴行。

这次民间俗称“吊劳改犯”的事件，大约始于八月十日夜，高潮持续了三四天。当时广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市区到郊区，到处可见吊尸，尤以市区繁华路段为多。死者大部份是被打昏打死后吊在电线杆或路边树上的，也有不少就倒毙在人行道上。整个事件约一个星期后才渐平息。前后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人？前因后果如何？从文革后公开的历史文献资料，很难找到任何完整的答案。

上身赤裸的死尸，肿胀发黑的死尸，满面血污的死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里躺一具，那里吊一双……光天化日之下，美丽的“花城”广州，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恐怖的“尸城”。

医院才两日，外面已千年。我掩鼻而行，一路上不时要蹲在路边干呕。

震惊，恐惧，恶心，然而没有怜悯——据说这些人都是劳改犯，对敌人是不能有丝毫同情的，革命让我们冷血。可我还没有完全麻木，当我崇尚追求的神圣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列宁语），冷不丁以如此峥嵘恐怖的面貌出现时，我深受刺激，内心更多的是惶惑和不安……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离家渐近，沿途不再见到死尸，但气氛并没有轻松下来。路上人流络绎不绝，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涌向“晓港公园”，伐木砍竹，或抬或拖，搬回自己居住地修筑“工事”。打听了一下，有说是“劳改犯”要血洗广州，有说是“旗派”和“总派”马上就要大打……总之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踏进美术学院大门，传达室已空无一人。路上碰到一个神色慌张的邻居阿姨，她对我说：“柴油机厂工人马上要来进攻美院造反派的据点，大家都四散投亲靠友避风头，你们一家昨晚也连夜离开了……”我半信半疑，撒开腿往家奔去。

看到门口石榴树下靠着爸爸的凤凰牌自行车，大门洞开，我心里才踏实一点。爸爸正和陈老师在谈事，见我突然回来，连声对我说：“好啦，好啦，你回来就好啦，你妈都急死了。她和你两个妹妹昨晚已进城，住在表姑姑家，因为不放心你，才让我回来等你……赶快收拾一下，

我们马上走。”陈老师见状也识趣地匆匆告辞而去。

我倚着门口并不挪动脚步，几番欲言又止，父亲便觉有些蹊跷。这时他开始注意到我手上裹的那团毛巾。我抬起手说：“爸，我打开给你看，你先不要紧张啊，没事的，真的没事，是别人，别人，不小心，走火，就、就打到我啦……”

父亲看着我逐层解开纱布，露出剩下四个指头的左手掌，他捧起我的手，拧着眉研究了好一会儿……我的心七上八下，正等着挨骂，没料父亲突然冒出一句：“还好，伤的是左手，不要紧。”我的心一下子松了。父亲又继续说，将来看看能不能配只假姆指，如果不行，自己用木头做一个……。我一听就乐了，只知道咱爹打油画框木工一流，还不知道他有制假肢驳断指的绝技。（后来他还真的锯了自家门前的石榴树，给我做了一个木手指，又设计了好些草图，要让木指具有弯折活动的实用功能，可惜一直没完成，否则中华文明就不止“四大发明”啦。）我当时可不敢笑出声来，趁机反催父亲快动身离开，免得他追问下去。

## （二）

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南到北穿过交通停顿，到处乱哄哄的城市，来到表姑姑家。当着父母和收留我们的表姑及姑丈的面，我不得不交待受伤经过。但我怎能把真实情况讲出来呢？一则会令父母担心，二则姑丈又是个“铁杆”保守派，据说还是小头目。收留我们这从“敌营”里逃出来一家，（父亲还是待罪之身，是暂时因为无人看管而擅离“牛栏”的“牛鬼蛇神”，）已是勉为其难，他们又早听说我是造反派，如果再知道我这般“反动”，岂不马上扫地出门？兵慌马乱之时，现在到处都在乱打乱杀，我们一家大小五口，何以藏身？我只好轻描淡写地说，是学校同学玩枪不小心走火打的。那一夜，气氛始终有点尴尬，表姑，姑丈没说什么，可已经乌云上脸，开始挂不住了。虽然这里住得宽敞，表姑丈还不至于连夜下逐客令，父母已坐立不安。商量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骑车到市内另一表叔家求援，征得同意，我们便千恩万谢告别表姑一家，赶紧转移了。

我这个表叔的父亲——即我的舅爷，早年在广州沙河拥有大片竹园，出产的“吊丝丹”竹笋远近驰名，固此是个殷实的地主兼商人。后来大军阀李烈钧垂涎这片土地，强行霸占，舅爷又沾上大烟，家道便中落下来，解放前夕已经一贫如洗，五个子女更无法受到完整教育，非工即农。文革来了，“阶级出身好”的人最吃香。当时在“环卫队”开垃圾车的“工人阶级”表叔，成了“响当当”的“领导阶级”不说，还参加了得势的“东风派”，更是神气得了不得。我自然是极不愿意去投靠这个表叔的，不光是因为派性原因，还为了“三年困难时期”（60，61，62年），他跑来撺掇我祖母说，人都不够吃，还养什么猫？自告奋勇背着我把我的“四蹄踏雪”给“处理”了。说是说在自由市场卖掉，我一直耿耿于怀，疑心我的爱猫已经祭了他的五脏庙。

住到表叔家很不自在。一房一厅，老老少少，原来就挤了七八口人，现在一下子加入我们大小五个，局促可知。好在客厅靠近天花板搭建有一个小阁楼，我们一家被安置在阁楼上。虽然连腰都直不起来，总算有了个临时栖身之处。最难忍受的是表叔的唠叨。以前他到我家，总要和我爸喝两盅。他爱喝的一种烧酒叫“肉冰烧”。只要酒一下肚，表叔的大鼻头立马变红。我私下就给他起了的外号叫“肉冰烧”。肉冰烧酒后特别多怪论。我记得他常批评我爸妈浪费钱——“油画颜料这么贵一支，公家不报销，画又不能变钱，画来干什么？我要是有你们这么高工资，我餐餐‘斩件’（指斩烧鹅、鸡、鸭等）日日肉冰烧，赛过活神仙！”现在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父母也倒了霉，肉冰烧岂不更得意，更有话说啦？肉冰烧是得意，不过这回矛头却是冲我来了：“昂漆九九（傻B），你都懵漆漆，人仔细细，学人造反反？好啦，现在反到连手指公公都不见了，知死未？你估共产党个江山这么容易被你们这帮‘柴娃娃’反转过来呀？

什么‘造反派’，丢那妈，真系不知所谓。你都毋脑，你地几支破旗旗，斗得过我地‘东风’？”我一边听，一边恨得牙痒痒，心里直骂：“臭老保，死老保，我爸我妈还没开口呢，轮到你教训我？臭老保，臭臭老保，肉冰烧，酒快点烧烂你个鼻……”表面上却不得不唯唯诺诺，俯首低头，努力作出悔不当初，发誓痛改前非之诚恳状。用广州方言说，就是“认屎认屁”啦。好在此刻没人用刑逼我，也实在没有“党的情报”可以出卖，那狼狈，那没骨气，已经和“红灯记”里的叛徒王连举不相上下了。唉，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一家五口流离失所，被人当“劳改犯”打死，曝尸街头——想想都胆发毛，你还硬得起来吗？

骂归骂，表叔口不饶人，心地还是好的。广州人只要流过血，动过手术，事后最讲究吃“生鱼”（又称“乌鱼”），据说有滋补活血生肌作用。现在农民不敢进城，连蔬菜都很难买到，何来生鱼？表叔叫表婶和我表弟妹阿坚，美娥，美莲，穿街过巷四处寻找，居然奇迹般搜罗到几尾。那时候外面世界白日里到处打打斗斗，血溅街头；夜里不时锣盆乱响，杀声震天。表叔一家大小进进出出，忙于四处抢购粮食和蔬菜。我们一家大小躲在阁楼上无处可去，只好吃了睡，睡醒吃。我喝着鲜美的鱼汤，有时和轮流爬上阁楼来的老表们斗牌斗得天昏地暗，就这样渡过了文革中难得的几天逍遥轻松的日子。

真应该好好感谢我的“肉冰烧”“臭老保”表叔。唉，小人不记大人过，“新仇旧恨”就此一笔勾消了吧。——“革命大联合万岁！”

八月十六日，也就是受伤一个星期后，父亲陪我到中山二院拆线，并交了三十多元的手术费。这时形势稍稍缓和一些，我们又搬回家住了。拆线后的第二天，我惦着学校里的同学，提出要回去，父母坚决不同意。

第三天大清早，母亲正在厨房弄早餐，我踱到母亲背后，轻声说：“妈，我今天一定要走……”

沉默。

……

“房间柜面上有三十块钱，你收好了。吃好一点，补一补身子，其它不要乱花。兵荒马乱的，身边总要留点钱应急。”停顿一下，母亲继续说：“知道留不住你，自己小心一点，听到没有？”母亲最后说：“如果战争真打起来，你回家找不到我们，就打开床头柜的暗格，里面会有一些钱和粮票。万一将来一家人失散了，你要想办法先找到表叔，我们都通过表叔取得联系……”

说这番话的时候，母亲始终是背对着我的。

（当时，曾任领导的父亲倾向保守派观点，留过洋的母亲也并不赞成过于激烈的造反行为。我每次回家都有争论。但是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即使在那非常时期，甚至是我遇险受伤以后，他们也仍然以极大的理解和包容，继续让我——四代单传的独生子，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我承认我在文革中做过许多错事，荒唐事，但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从来没有昧着良心做过一件坏事；我一生也许只是平平凡凡，不会有多大成就，但我决不怠惰，决不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文革令我从此淡薄了权力的野心，同时也培养起我的独立人格，激发了我对真理的渴求——还有什么比追求真理的人生更有意义呢？

谢谢亲爱的父母。当我长大成人，为人父以后，我才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在某些时候，信任，对于父母一方来说，可能就意味着难以承受的风险。那巨大的压力常常是无以言传的。但

信任对于孩子而言却是无价的——可能就成为他用毕生回报父母的动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正是文革中发生广州造反派攻打“省总”大型武斗的日子。事先并不知情的我，选择这天重返学校，刚刚才逃过生命中一劫，又陷入另一险境……

## ◇ 白鹤风云

### (一)

八月十九日，上午十时。

我乘坐的十四路公共汽车，刚到海珠桥脚便停下来不走了。原来离桥仅二、三百米之遥的省总工会大楼正爆发激烈枪战。听车上的人议论，是造反派在围攻据守大楼的保守派。起因于几天前保守派在“白鹅潭”江面上，包围打翻了对方准备去抢枪的一条船，并把落水的21个人当“劳改犯”扫射，当场打死了18人，现在造反派要复仇……

下车过桥西行，上一德路，经过“省总”附近，只见大楼对面几个街口都挤满了围观者，时而哗哗涌前，时而哗哗倒后，随着枪声的疏密节奏，象波浪般起起伏伏，场面蔚为壮观。时不时有人脱出人群，猫腰小跑冲入大楼四周交战双方之间无人区，捡起还在迪逍遥打转的子弹头或楼上窗台掉下来的子弹壳，归来便引起哄然一片喝彩声。

文革武斗，其激烈以四川湖北为甚。川人好斗，那时节吵架辩论，三句不合，就要“放你的血”。湖人更是自古便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美誉。广东武斗和外省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而已。此皆因南方气候温和，粤人性非刚烈。粤人之“精”，是早有闻名的。但这打架怕死，睇（看）打架冒死之“今古奇观”，又该作何解释呢？其实也是民性使然。广州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开埠最早的商业城市，长期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市民文化，这种文化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表现为异乎寻常的好奇心。街上店铺若是有人登高在写招牌，第一个路人抬头看见，停步，眨眼之间整街的人都会停下来，个个伸长脖子仰望，交通便为之阻塞……广州人自嘲“倒泻屎都睇”，那是真话。连农民打翻屎桶，臭味熏天，都还能引起围观，现在人生难得一见的真枪实弹的“街头剧”就在自家门前上演，岂能错过？所以说广州人精亦有笨，笨亦有精，蛮可笑，也蛮可爱的。（后来“打西村水厂”一役，围观者终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

有人打仗，有人睇打仗，有人睇睇打仗之人。吾亦好奇，吾亦广州人也。

这一耽误，待斜穿过广州城，步行到达西门口十九路车总站时，已经日过三杆，饭铺飘香了。早上怕母亲改变主意，匆匆离家，早餐都来不及吃，后来又走了这么长一段路，焉能不饿？我顺步拐进路边一个熟悉的小饭铺。此地是往郊区学校的中转站，文革以来学校市区两头跑。常常就在这里打尖歇脚，顺便解决“肚子问题”。以往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多半会要四分钱（四两）白饭，五分钱青菜就搞掂。有时甚至不叫菜，只要白饭，浇点酱油，或者买三分钱菜汤泡饭，也能对付一顿。今天坐下来，心慌腿软，感情是饿乏了。我要了五两白饭，找位置放下饭碗，正准备像以往一样去打青菜，忽然想起离开家时母亲叮嘱我要补充营养……攥着口袋里的几张“大票子”，我踌躇了一下，终于决定今天就“资产阶级”一回。可是我没有经验，一时又不知该点什么菜好。这时，同桌对面的一个袒胸露怀的“咕哩佬”（搬运工），正叫来一碟田鸡炒芥兰和一碗肉汤准备用餐。他见我对着白饭发楞，以为我没钱买菜，便顺手把那碟小炒推过来，“细佬，学生哥呀，我未掂过，你吃啦，我再叫多一碟……”我毫无思想准备，被这突然而来的慷慨闹了个大红脸，连忙甩手拧头，谢绝了对方的好意。但与此同时，眼前这碗面上漂着几片白花花肥肉的香喷喷的肉汤，也助我拿定了主意。我学着工人叫菜的样子，敞开嗓门吆

喝店家送来一碗三毛五分钱的肉汤，用汤泡饭，美滋滋地“大吃”一气——文革两年中，这大概是我在外面吃过的最奢侈的一顿了。

## （二）

下午两点多，我又回到学校。

广州八中，前身是有上百年历史的教会学校——“培英中学”。半个多世纪前，我的祖父就是从这间学校毕业的。（我祖母也毕业于紧邻的二十二中——“真光女子中学”）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学校：座山临江，半山宿舍区都是一幢幢被浓荫环抱的独立西式别墅。绿茵铺连，棕榈夹道，非常整齐美观。校本部设在山顶，更是红墙绿瓦，琉璃飞檐，气势非凡。学校有大礼堂，科学馆，大型体育场和江边游泳场……这样的条件，找遍全中国恐怕也不多见。

此刻，诺大的校园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只有几只在课室窗台上懒洋洋摊开四肢呼呼大睡的野猫，还有不时穿梭在竹丛树林中糝草拾柴的附近农家孩子。

我转了一圈才在校门口“钟楼”下面的传达室遇到造反团的二把手，高三级的同学“四眼”。四眼一手扶着用胶布缠住的摇摇欲坠的一只眼镜腿，另一手戳戳我：“鸡蛋头，你回来得正好，我们晚上要安排值班，武工队人都不在，只剩几个女同学，人手不够。”我本来只是打算回校看看就返回市内总部，既然如此，便只好留下来了。原来学校形势也很紧张，留守学校的十几个同学此时都已经集中撤进了钟楼。这座三层楼高的塔式建筑，是整个白鹤洞地区的至高点，虽易守难攻，却也孤立无援，双方一旦开火，被围困在里面恐难有生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想的却是晚上值班肚子饿怎么解决？四眼说还有一包煮浆糊用的木薯粉。我拍拍口袋：“钞票大大的有，黄糖米西米西的不成问题。”四眼大喜，两人便结伴前往白鹤洞墟镇采购。

下得山来，正要穿过“广佛公路”，对面就是墟镇口写有“白鹤洞人民公社”几个大字的大礼堂，忽然有两辆恰在面前交会的对行汽车引起我俩注意：我觉得下行的小吉普似曾相识，好象就是抢枪那天随后的第二部车。四眼扶扶眼镜，一脸不屑地死死盯着上行那部大卡车，车上人人手持长枪，个个杀气腾腾。四眼说认得他们，就是船厂“X青”——一伙臭名昭著，无恶不作的流氓。我俩边议论边穿过公路。就在此时，忽然背后响起“啪、啪”两声枪响，几秒钟的沈寂之后，“轰”然一声巨响，吉普冲出大路，翻倒在农田里。随后大卡车也在半坡上停下来，车上的人纷纷持枪跳下来，散开在公路两旁，找寻射击掩体，居高临下，举枪瞄向吉普……当时两车相距约百米，我俩处在中间偏近吉普的位置。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三时许，广州白鹤洞地区就这样打响了文革两派武斗的第一枪。

枪声再起，我赶紧弯腰跑向礼堂躲避，可是跑了一段，回头不见四眼跟上来，原来他还直楞楞站在路上，双手扶着眼镜，伸长脖子向吉普车处张望……我只好硬着头皮跑回去拉他：“有没搞错，喂，四眼司令，放下你那‘望远镜’，快点逃命吧。”这个“眼镜仔”，别看他斯斯文文，头壳大大身肢细细，手无缚鸡之力，却认真是个不怕死之士。此刻他无视枪林弹雨，赤手空拳，一心只想救援别人。我心急脚颤，用尽吃奶之力也拽他不动。就在我俩拉扯僵持的这一会儿，附近的路人已纷纷越过我们，跑进礼堂。四眼不但不走，还趋前几步——原来是后面有一个老头和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夹拥着一个少女迎面奔来。那女子长发垂肩，柳眉杏眼，脸暂白，唇微张，胸脯一起一伏，白衬衣上散布着许多殷红的细血点。（如果不是瞥见胸前“第一师范”的校徽，我还以为是观音下凡呢。）未见她身上有伤，想必是车上其它伤者溅上的血。果然，就在后面十几步远，跟上来一个血流披脸，侧身手提驳壳枪的工人（估计是司机）。但他没有继续跑向我们，而是转弯拐进墟镇街道，身后留下一路血滴……此时路上已空无一人，子弹在



头上 “啾、 啾” 飞过，我们几个赶紧互相拥簇着掩护 “落难观音” 躲进礼堂。

礼堂里已经有老老少少二三十人，有的蹲在地上，有缩在椅间，个个神色惊惶。我们刚刚混入人群中，门口就冲进两个端枪的赤脚光头的农民，凶神恶煞扫视了一圈，大声喝问：“你们都是什么人？！”如果此刻他们走近逐个检查，势必会看到梨花带血的 “落难观音”。一旦把我们扣起来，四眼是头头，在武斗已打响以后，如被认出来，处境会很不好。再加上我新伤在手，10 天前在广船抢枪又曾 “充分亮相”……我们实在非常危险。但当时我们并没顾其他，只是下意识地尽量把 “观音” 挡在后面。幸亏这时外面枪声更促，大汉无暇细察，转身蹬蹬爬上二楼电影放映间，很快就听到楼上也响起爆豆似的重机枪声。大约过了十分钟，枪声停息，接着是一群人杂乱的脚步声跑过，估计是遁血迹穿墟镇追踪去了。乘此机会，避弹的群众纷纷站起来，我们便随着人群，从侧门涌出礼堂，跟着几个熟悉环境的当地居民，翻过礼堂背后的土墙，进入镇西侧的街巷。人群很快各自四散了。那抱孩子的妇女原来就住附近，眼睁睁看着她把 “观音” 领回自己家，我好失落——“英雄救美” 好戏才刚开始嘛，这么快就完啦？“喂，鸡蛋头，不如你也跟去吧？”四眼摘下眼镜，眨眨眼，推了我一把，把我闹了个大红脸。

街上最后剩下六个人，交谈之下，知道原来都是我校和邻校 22 中的同一派学生。这时枪声又起，我们无处藏身，幸好有居民主动把我们带进自家小院。枪声一阵紧一阵松，也不知道在打什么目标。四眼惦着钟楼那边群龙无首，几次转移想突出去，都不成功。街上不断有持枪的对立派在警戒搜索，我们只好左闪右避，危急时候，不得不躲入饭店，藏进民居。最后还是一个好心的单身汉把我们六个学生都领进他那狭窄得仅容下一张大床的小住房，让我们并排躺在床上，他用将军锁把门从外面锁上，直到傍晚枪声平息，他才回来开锁，指引我们趁暮色从镇侧田野遁走。（事后四眼和我曾专门登门拜谢）

### （三）

回到学校，才知道过去的三个来小时，形势已经急转直下。自从下午对方突然打响第一枪，广船保守派就把钟楼当作目标，从隔墙的船厂宿舍区向我们射击，有几发子弹直接射进三楼窗户，在水泥墙上撞扁了的铜弹头就跌落在地上。这座塔楼空间窄小，以前大概是挂大钟的地方，因此六角型的窗洞特别大，通透不设窗框窗门，以便钟声远播。现在这些高高大大的窗洞正好成了靶子。幸亏当时三楼没人，否则非死即伤，难逃一劫。但我们有好几个同学还是在出入学校后门时被抓走了。四眼一回来马上安排组织救援，同时指挥大家搬来桌椅，把钟楼内的螺旋楼梯堵塞得每次仅能容一个人侧身上下，据说是防对方夜袭。这一夜，四眼负责通宵在楼上守望，其余的男女搭配三人一组，分成三班，轮流到校外的半山腰上放流动哨……

下半夜，我在朦胧中被推醒了，迷迷糊糊从权作睡床的大字报堆里爬出来，跟随着握有一枝手枪的同学下了楼。

穿过分隔两校的竹丛，我们进入二十二中，在半山坡一处以前民兵训练用过的废战壕里趴下来，居高临下监视公路——这正是几小时前发生射击翻车的地方。

圆圆的月亮，象个黄澄澄的大铜盘悬在天际。山野被一层柔柔的晕光罩盖着。蟋蟀的脆鸣，纺织娘的沙吟，蚯蚓的吭叫，还有山下水塘里蟾蜍此起彼伏的低音合唱……热烈中透着一种祥和宁静。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夏夜。下次月圆之时，将是中秋节，也就到我 17 岁的生日了。我忽然想到，半个多世纪前，我的祖父母也是这个年龄，也曾求学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后来祖父投身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协助廖仲恺工作，为中国（旧）民主革命操持奔走；祖母则是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女性，后来办教育，振新学，也算是中国妇女革命的先行者。但他们又怎么可以和我们今天相比呢？别说他们，就是后来我父亲加入地下党，参加了推翻 “三座大

山”，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都俱为历史了。我们今天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是“解放全人类”的最彻底的革命。我为自己能有幸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而自豪。千古江山，英雄何觅？今夜里，我就是在用我17岁的青春热血，守卫这片土地，守卫我崇高的理想。革命，就象头顶上的明月，那么美丽，那么庄严，那么圣洁……

酣梦中的墟镇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很快就沉寂下去。月渐西斜，看来今夜无战事了。

有些许失落吧？其实你是如释重负。如果对方真的来袭，你们又能做什么？你真的盼望战斗吗？你只是渴望当英雄罢了。你胆子小，心慈性善，而革命的英雄必须是热衷暴力的，你行吗？你不爱暴力，你只是愿意象丹柯那样为真理献身，可真理又在哪里？你们这一代人顶礼膜拜的理想，真的就如天上的月神娘娘那么美丽圣洁，值得你付出生命代价吗？……文革以来，特别是最近这十天经历的事，一幕一幕象过电影似地在我脑海中闪过。革命，和课堂里书本里歌曲里电影里唱的大不一样嘛；革命，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是如此血腥，如此野蛮，如此荒诞，如此……？

凌晨，大地窜升起一股寒气，从我的脚心透过全身直冲天门盖。我打了个冷噤。

起雾了，月渐苍白，一切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 后记

我是8月20日离开学校的。数天以后，留守学校的全部二十多个同学，也不得不乘坐总部派来救援的卡车，撤出已经完全孤立的白鹤洞山顶。因为当时郊区公路沿线都为对立派控制，撤退行动非常隐蔽，车厢已用帆篷遮得严严实实。不料车行至“花地大桥”，司机担心桥头对立派据点拦截，加大油门，翻过桥顶准备冲下坡时，迎面突然遇上两个搭载同一辆自行车的农民，正摇摇晃晃横在路当中，汽车闪避不及，一下子就辗过去了。

司机当场吓得把不住方向盘，汽车失控冲向路边，连续撞断了两个护路的花岗岩石碑柱，眼看翻车伤亡不说，就算事故不死，也难逃过愤怒的当地农民及据点的对立派武装。幸好司机右座的化工厂工人郭绍权扑过去，拼命扳回方向盘。全车人大难不死，逃过一劫。不幸的是，几天以后的“西村水厂争夺战”中，郭被不明方向飞来的子弹击中颈动脉当场死亡……

八月二十日当天，发生了震动全市的“八二0事件”——造反派几批车队好几百人分别前往郊区三元里部队仓库抢枪，结果先后中了保守派埋伏，当场被打死及被俘后枪杀数十人，是广州文革武斗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屠杀事件。

事发时，我正回到市中心的海珠广场“广交会”陈列馆造反派大本营。中午我在陈列馆食堂打了饭，上楼以后从玻璃窗看见大楼后面大院里停了好几部卡车，听说是准备出发往三元里抢枪（其时已经有几批人先后中伏了，这边大本营竟然毫无所闻，还继续自投罗网）。参与行动的工人、干部、大学生、中学生……男男女女什么人都有，以中学生居多。当时场面非常混乱，人们四面八方呼朋唤友涌向汽车，从前后左右争先恐后往上爬——仿佛三元里已摆满枪枝弹药等着大家去任意搬取。“手快有，手慢无”。上了车的人许多可能互不认识，更不见有组织者点名布置，车已起动还有人追着扒上去……

目睹外面的热闹情形，只要一念之差，我也就扔下饭盆跑出去了。但此时我竟没有一丝一毫要跟上去的冲动。倒不是我有什么先知先觉的不详预感，其实当时连我都对自己置身事外的

冷漠感到有点吃惊。也许，经历过死亡以后，我开始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了吧。

下午不久，遇伏的恶噩陆续传来，愁云惨雾笼罩了整栋大楼，高层灯火通明彻夜开会。什么“内奸”“朝鲜间谍”等传言满天飞……。

至于那几部汽车，就再也不见回来了，其中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被俘或失踪了？恐怕已经永远没人能回答。

八月二十一日一大早，有关“八二〇血案”的大字报大标语已贴满全城。我独自跑到西门口“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临时扩大的停尸间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感受到死亡。我穿塑料凉鞋的光脚，就浸在溢流满地的福尔马林（防腐剂）和血水的混合液里。地上一排排躺了几十具尸体，从屋里延伸到走廊，直至摆到屋外。迄今难忘的是一个英俊魁梧的青年工人——走在路上，见到这样壮硕健美的男子，你都会不由自主多看两眼，那仿佛就是生命和力量的化身啊！可是他现在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印有“新中国造船厂”字样的工作服敞开着，胸前有一个结着血茄的小小弹孔。他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听说是他妹妹，正嘶心裂肺地嚎哭，拼命要从劝阻的人手中挣脱扑上去……。还有一个娇小的女学生，一身当时流行的绿军装，虽然宽松不合体，但衣着整齐，看不出任何中弹受伤的痕迹，留意看才发觉，盖着她脸上的手帕是凹陷下去的——原来是被“达姆弹”——一种日内瓦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灌铅子弹，炸去了半张脸。我不敢想象手帕揭开会是怎样的恐怖。我忽然想到了“观音”，只觉得心脏被狠狠抽了一下。我并非没见过死亡，一个星期前那满街的吊尸，只是令我恶心、厌恶和恐惧。谈不上，也不敢有对“非我族类”的怜悯同情。文革，已经使我们每个人的心肠变得象石头一般硬，一般麻木。可是此刻，我不仅仅有兔死狐悲的震撼，也有一种美丽被亵渎被毁坏被砸碎的破灭。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憎恨暴力，我千千万万遍诅咒暴力！

离开停尸间，我最迫切想做的事是找一处公用电话。我终于找到了，嘈嘈杂杂围了许多激动的人，终于轮到我。

接电话的正是美院传达室的光伯。那时没有什么私人电话，单位电话一般又只能公用，不负传呼之责，但我和光伯关系特好，（因为文革前放暑假，我都“学雷锋”，帮光伯送报纸，）我知道光伯一定会帮忙的。

我紧紧抓住话筒，大声喊叫：“光伯，告诉我爸爸妈妈，不用担心，我没事，我很平安，我很快就会回家了。”

谨以此文纪念文革四十周年，深切悼念文革中死难的同胞

（注）造反派称自己的对立面为保守派或“老保”。文革时期，一般而言，所谓“保守派”，是指“保”各级党政领导，对毛泽东“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革方针感到不理解的一派群众。文革前这些人大部分是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党员骨干……他们往往出身贫苦，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造反派”即指积极起来造当权派反的另一派群众。造反派成分比较复杂，一方面，许多人固然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对毛文革路线的认同而造反；另一方面，起来造反的人往往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受过某种程度的压制打击。保守派通常以产业工人为主，人数较多，而且得到原当权派和军队暗中支持，在两派斗争中大部分时间都占了上风。造反派在学生中占多数，工人中则以青年工人为主。造反派在文革头两年高潮中曾得到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一九六八年“革委会”逐步建立起来以后，造反派逐渐失势，在一些地区受到军队的围剿镇压，在其余地区虽然是被以“两派大联合”的方式和平瓦解，但其骨干分子无一能够逃过随之而来的“秋后算账”——一九七零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乃至文革后的“清查三

种人”运动。这种情况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广州当时的造反派分成许多山头，因为几个影响较大的组织都命名为“XX旗”，而且周总理在接见时肯定了“中大红旗”和“三面红旗”是革命派，因此他们自称“旗派”。保守派因为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命名为“XX总部”，一般称为“总派”。但他们也自称“东风”，缘自他们坚称六七年三月镇压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是“三月东风浩荡”。

~~~~~

## 【往事追忆】

### 北航“国际红卫军”事件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1967年夏，北航红旗内部有几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叫“国际红卫军”的秘密组织，公开的宗旨和口号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推向全世界，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实际上是反林彪的。主要人物叫白晓宏、曹伟康，二人皆是干部子弟，平时关心政治，博览群书，思想比较激进和活跃。他们认为，文革以来林彪的表现和言论十分出格和反常，令人怀疑。林彪对毛主席的评价不是实事求是地赞扬，而是别有用心地吹捧，令人肉麻。许多话是明显错误的，违背了事实和辩证法。林彪的心术不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要捣鬼；林彪军权在握，靠吹捧毛主席成了接班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林彪当了中国一把手，许多人要人头落地，全国非大乱不可；林彪才是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看错了人，树林彪当接班人是极大的失策，早晚要吃大亏；在中国，绝对不能让掌握枪杆子的人当一把手……白、曹二人秘密地向许多人特别是北航红旗的头头们散布他们的观点。他们还认为，北航红旗已经成了“保皇派”，成了毛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怀里的“阿斗”，不再继续革命了；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应当继续造反，造林彪的反，把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揪出来示众。那样，北航红旗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才会受到全国、全世界的赞扬和佩服……

据我所知，北航红旗有好几个头头对白、曹二人的观点表示了默认，起码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和制止。其中革委会副主任田东竟然赞同和支持白、曹二人的观点，并秘密介入了他们的行动。例如，为了验证林彪某一天是否上过天安门，田东曾带领白、曹二人专程拜访了当时国务院秘书长周某某。

由于我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和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白、曹二人也偷偷地向我散布过他们的观点，但因我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达到他们那样先进的程度，对林彪的认识还同芸芸众生一样，所以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观点，并劝他们不要胡思乱想、怀疑一切，不要到处散布这些观点，以免惹是生非。由于白、曹二人是北航红旗的“老造反”，同我很熟，出于派性，我不可能出卖他们。

当时的中国，“公安六条”有明文规定，反林彪绝对是反革命，要抓起来坐牢甚至杀头的。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白晓宏、曹伟康二人反林彪和北航红旗头头态度暧昧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有人开始发难，让头头们交待清楚。如此发展下去，北航红旗将有灭顶之灾。韩爱晶等头头们看事不好，立即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统一口径，并立即把白、曹二人的情况上报了北京卫戍区。很快，卫戍区就来人把白、曹二人抓走了。

作为保卫部长，这事本来归我管，可能因为事情太严重，太突然，韩爱晶和主要头头们没有让我处理，我也乐得做好人，一身轻松，两袖清风。

1968年春，白晓宏和曹伟康在卫戍区被关了半年之后放回了学校，按照上面指示，回来劳动改造。我安排他们在学院绿化队劳动了一段时间。按常规，二人应开除学籍或留校查看。同样是出于派性，我丝毫没有为难他们。后来我毕业了，白、曹二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估计在后来的抓“5·16”运动中，二人日子不会好过。1971年林彪摔死之后，二人肯定已彻底平反。

关于北航革委会副主任田东，后来在革委会作了检查，受了批判，最后不了了之。值得说明的是，我当时奉常委们之命，曾负责整理过田东的交待材料，并上报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我做了一件对不起田东的事，尽管是奉命的。

田东毕业后抓“5·16”时被整得很厉害，直到林彪摔死后才平了反。我借此书再一次向田东老同学和战友表示诚恳地道歉。

~~~~~

## 【难忘岁月】

批邓、悼周和粉碎四人帮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十章：“浪遏轻舟”，标题为编者所加。）

### ◇ 为邓小平而叹息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像批林批孔来的那样突然，有一个从打招呼开始，而逐步发展的过程。七五年十二月上旬，这时我已到省电子局机关协助滕野翔工作，代表省电子局参加四机部召开的电子工业领导干部座谈会。随我同去的有计划处长孙振鸿，计划员路明卿。会议期间，由四机部副部长王子纲传达毛泽东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精神，也算是给电子工业系统的领导干部打招呼。在毛泽东的指示中讲：“刘冰的信不直接寄给我，而要小平转个我”，“小平偏袒刘冰”。而且点名“刘冰的信是把矛头指向我的”，“清华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应，是一股右倾翻案风”。等分量很重的话。我一面听，一面觉得心里很沉重。全国的生产形势刚刚步入正轨，现在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家怎么办？

传达会是晚上进行的，听完传达后，没有马上组织讨论。我回到宿舍，背靠在床上没躺下，而且不停地长吁短叹。这时孙振鸿开腔说话了：“这么晚了，梁局长还不睡觉，老叹什么气呀？”这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想不通，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还不到一年，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不可在党内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就是他犯了天大的错误，也不能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不知主席想过没有，再把邓小平这么一搞，以后谁还敢站出来工作？一犯错误就打到，这个国家怎么办？”

孙振鸿是长期给原省委领导任质斌做秘书的，也许他觉得我的话说得太过了，他既没有附和，也没有让我说出更多不理解的话。他只是说：“梁局长，别多想了，抓紧睡觉，明天还要开会。”

第二天，讨论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在讨论中，我实在记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后来由孙振鸿整理给大会秘书处，发了一份大会简报。

到了七六年二月，批邓的风声渐紧。由于电子局几位主要领导干部身体都不太好，能正常上班的不多。我从工厂到局机关上班后，滕对我很放手。行政事务基本都由我出面处理。滕因偏头痛，上班也不正常，几个局长很难凑齐开会，几乎是我唱独角戏。具体工作，我只好与处长们一起开会商量。由于人少事多，顾上“抓革命”，就顾不得“促生产”；顾上“促生产”，就顾不得“抓革命”。所以三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局机关几乎没有怎么开展。只是在会上，我有过两次发言。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合肥晶体管厂有点乱，生产不正常。为省无线电厂配套的半导体器件不能如期供货；为上集成电路，而搞的超净车间也停了下来。我从局机关，带几个处长和市电子局的几位主要领导，一起到晶体管厂开中层以上干部会。在会上，我要求中层干部，要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我说：“‘天安门事件’以后，许多城市如：南京、武汉、西安、长沙、重庆等，都发生了与‘天安门事件’类似的事件。为什么呢？‘天安门事件’反映的是一种思潮，思潮有时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这决非一人力量所为。我希望晶体管厂的职工要坚守岗位，不要到大街上看热闹。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我不承认有的报刊上说，‘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挑起的。第二次讲话，是在全省电子工业系统学大庆积极分子代表上。这次讲话时照稿宣读的，这是我唯一一次读稿子。结果在稿子里有批邓的话。但这份稿子，是省电子局工业学大庆办公室起草，经几位局长传阅修改认可的，我不能不读。由省工交系统组织的批邓大会，我就推辞没去。写好的稿子，我也没读。

#### ◇ 在悼念周恩来的日子里

从北京开会回到合肥后，对四机部会议内容都没来得及向全省电子行业贯彻，省革委会于七五年底或七六年初，又在萧县郭庄大队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期间，元月八日早晨，我在去厕所的路上，突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在早晨六点新闻联播节目里，一开始就放哀乐。我留住脚步，想知道是谁逝世了。结果传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我一下惊呆了，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再仔细听下去，就是周总理逝世了。顾不得上厕所，跑回集体宿舍，把大家喊起来听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开始，不少人和我一样不敢相信，由于这条消息不止播一遍，大家再听，证实总理确实是逝世了。于是与会人员都穿起衣服，自发地站在房外低下头来听广播。

上午停下讨论学大寨，赶郭庄的议题。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学、赶、超。但大家还忍不住内心的悲痛，不少人发言时，失声痛哭。与会人员要求搞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开始会议已经发了黑袖章，人人都佩戴在自己的左臂上。后来大会又突然通知，不要戴黑纱，说这是中央的要求。但大多人没取下，我也没取下。另外还不准搞悼念活动。但我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在会上不敢念，怕不符合中央精神，被别人抓住小辫子。回到合肥后，本来想抄出来，贴在办公室墙上，但又怕出丑。因为局长们在一个办公室集体办公，滕局长的诗书都很好。所以我一直把它藏在本子里。现在不怕出丑，因为历史都是过去的存在，我把它抄出来：

#### 悼念周总理

千古铁笛奏英才，我放高歌咏恩来。  
七十八年弹指过，犹度人间五千载。  
万代风流断线筝，总理化虹站长空。  
俯视寰宇连天火，处处皆是狂飙声。  
业未尽，人先归。亲人何时再能回？  
手持怀梦草，但求梦相会。

醒来抚枕席，留下斑斑泪。

全国上下正在怀念周总理的时候，省委按中央指示精神要求，从四月中旬起，开始追缴“总理遗言”。到底有没有“总理遗言”谁也搞不清。但省直机关党委抓得很紧，一天一汇报。局政治处干事每天都问我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动员局机关，谁有就自动交出来。没有，我们也不能造。实事求是汇报。”

有一天上午，政治处干事神色紧张地找到我说：“我们局物资处的某某交来一份，说是她女儿从晶体管厂搞来的。”我说：“真有？带来没有？”干事说：“带来了。”我说：“你先把它留在我这里，我还没有见过，我先看看再说。”干事问我怎么向省直党委汇报？我高诉他：“你就说，我们局正在积极追查，查到后一定马上送来。”

干事走后，我把所谓“遗言”仔细看一边，我觉得写得很好。事实上是有人借总理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肯定邓小平的成绩，表示对批邓的不满。这份所谓“总理遗言，”被我压在抽屉里，一直没上交。

#### ◇ 粉碎“四人帮”

我在北京开会时，也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觉得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可以安安稳稳地搞建设，尽快使国家富强起来；另一方面，也感到政治风向可能会转变，自己成为秋天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与我同宿舍的省计委计划处长总是说：“文革中，你又没有干坏事，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这一点谁不知道。安徽的文革，不是你老梁控制的好，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你跟“四人帮”又没有关系，总不能把造反派都打倒。”我觉得这些话说得虽然都是实情，也只是安慰而已。反正我做好了打算，让我干，我就好好地入党工作；不让干，我还去教书，反正我一技之长。

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按逻辑，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的政治生涯也应随之结束，但由于我在组织上跟“四人帮”没有任何联系，加上我又是安徽炮打康生、王力、关锋的“罪首”，胆敢质疑林彪的“天才论”，也确实又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这些因素又使我的政治生涯延续一段时间，但从我内心出发，想早点结束，让自己属于自己。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